

对我国经济波动生成机制的分析

刘光杰 杨胜刚

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都是一直递增的,经济增长出现上下波动应当被视为一种正常现象。问题在于,当经济增长长期波动,且落差加大,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不能解决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时,则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我国建设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波动过频、幅度过大不仅会带来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对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有时甚至会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虽然保持着一个相当高的增长水平,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却是在多次较大的波动中实现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是一个客观存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我国经济波动的生成机制作一简要分析。

(一)

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波动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论其根本原因如何,从最直接的原因来说,经济波动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性变化是由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变化决定的。在我国资源相对稳定,总供给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原因便在于总需求的变动,即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波动。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 and 投资需求构成,从我国消费需求的历史变化相对稳定以及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极低的情况看(我们对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出: $Y=3.5083+0.0512X$, $r=0.1066$ 其中 Y 为社会总产值, X 为居民消费水平, R 为相关系

数),我国总需求的波动就主要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因此,我们将以此展开经济波动生成机制的分析。

投资波动:中国经济波动的生长点

投资之所以导致经济波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投资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形式,它扩张和收缩会直接带来投资品生产部门和投资服务部门的波动。从我国经济运行实际资料来看,社会总产值的波动并不意味着其所包括的五个产业部门都以同样波幅波动,其中,建筑业波动幅度最大,其次是工业,农业波幅最小。如果将工业波动分解:重工业波动明显大于工业波动。在经济扩张时,重工业增长率高于工业增长率;而在经济收缩时,重工业增长率又低于工业增长率。这说明工业波动更大程度上来源于重工业波动。重工业又可划分为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其中,机械制造业波幅大于重工业波幅。因此,制造工业波动是引起重工业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经济中波动幅度最大的经济部门与投资的联系密切。建筑业是直接为投资服务的,担负投资项目的施工和安装,所以,最先受投资波动影响的是建筑业;另外,重工业的产品主要是生产资料,大部分用于投资,其中的制造工业最终产品基本上是投资品。所以,投资波动意味对重工业产品,特别是对制造工业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剧烈的投资波动必然会引起大幅度的重工业波动和更大幅度的机械工业的波动,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在波动中运

行。

其次，投资高涨必然通过各部门产品交换带动社会总需求连续扩张。因为，投资一旦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则会由于，一方面生产者收入增加而产生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提供有力的物质基础，唤起消费资料生产部门扩张的欲望。投资扩张就是通过以上两条渠道：即需求拉动（对直接为投资服务部门和投资品生产部门的需求扩张）和供给推动（由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供给能力增强而带动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投资扩张）共同推动我国经济不断走上扩张的高峰。

但是，由总需求所带动的国民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将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基础投入短缺的限制；二是扩张过程中产业结构失衡的限制。

首先，我们仅以能源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需要来说明基础投入短缺问题的严重性。众所周知，我国的能源缺口大、使用效率低，人均消费水平低，生产耗能量大。根据1980年的资料，我国发电量仅及美国的13%，年消费能量仅及美国1/4，人均年消费能量更低，不及美国的1/21，仅及世界水平的30%，一美元国民产值能耗世界平均为0.84公斤，中国为2.5公斤。进一步地分析将更能说明问题：80年代初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①为 $P=1.42$ ，一般先进工业国为0.8，如果要达到1982年中央提出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则应达到 $P=0.5$ ，即比先进工业国的技术水平还要高出1/3。若以目前每亿元产值要供应10万吨标准煤计，到2000年前就需要28亿吨。即使加上种种技术改进和节能措施的考虑也至少要20亿吨。缺口达40%。据我们对湖北省能源生产的供需缺口调查，全省自1985年到1989年五年间平均每年本省能源自给率仅为43%左右。目前全国缺煤2000万吨，缺油1000万吨，缺电力约1000万

瓦，缺电量6000—7000万度，工业生产能力中只达到潜在生产能力的70%。^②

其次，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工业结构中发展最快的是机械制造工业，其比重1955年占工业总产值14.7%，到1984年高达36%，在工业中的比重由第3位跃居榜首；同时，原材料工业的主体——冶金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的比重则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化学工业仅次于机械工业而上升至第2位（占24%）。这种排列顺序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结构顺序一致。正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机械工业，化工工业大幅度上升和代表传统产业的食物、纺织工业比重大幅度下跌，使我国工业结构的加工程度迅速提高，接近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尽管加工水平尚有较大差距）。这种重工业化迅速推进出现的高加工度化倾向是产业政策失误导致的恶果，长期以来，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使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电力供应、运输能力不足，原材料短缺，农业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正是由于经济扩张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和基础投入短缺的缺口拉大，就为经济决策部门提供了紧缩和调整的信号，于是，现实的经济压力迫使投资主体压缩投资规模，减少信贷总量，收缩代替扩张，在这种机制作用下，经济运行进入收缩状态。经济运行中扩张冲动和收缩压力的耦合就构成了投资波动引致经济波动的整个机制。

（二）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投资的波动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投资无疑是投资主体结合特定的经济环境为实现自身利益目标而做出的决策行为。因此，只有通过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分析，才能把握投资波动的深层机理。

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投资主体的变化，因此，我们将从改革前后不同投资主

体的行为特征来进行分析。

改革以前，中央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迫于当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选择数量扩张型投资行为是历史的必然，因为：

(1) 我国是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迈开工业化步伐的。新生的共和国在一个极端落后的经济环境中，85%的人口仍处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与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发展水平差距极大（见下表）。

1949年中国与其它国家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

国别	产品	钢 (万吨)	原煤 (万吨)	发电系 (亿度)	水泥 (万吨)	棉纱 (万件)
中国		15.5	3200	43	66	180
美国		7047.0	46597	3457	3594	945
苏联		2327.0	23556	783	815	338
西德		916.0	19052	357	846	125
日本		371.0	3974	410	328	86
印度		137.0	3220	49	214	339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分配的优化与经济发展》，《管理世界》，1987年4期。

同时，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市场化指数仅为50%），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人口占70%）；出口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其贸易条件也不利，科学技术和人口素质较低。^③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要想首先从提高效益入手赶上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经济效益提高的潜力极为有限。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直接受土地的自然生产率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率的制约；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在国际贸易中总是以出口农副产品以及其它附加价值小的初级产品为主。因而使之长期处于国际不等价交换的利益受损地位；此外，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较低，也阻碍了各种物质资源利用效率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想改变这种旧的国

际分工秩序和国内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就必须迅速强化国内的工业化基础，在一定时期内就要以上新项目和追求发展速度为主。

(2) 经济发展速度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改革前中央投资主体以投资冲动带来速度增长而舍弃效益型增长。首先，实行高速度与实行高效益所需条件不同。高速度可以在科技水平不变或进步不大的条件下靠投入更多生产要素来实现，并且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属于资源闲置和劳动力富余的国家，这就为其选择高速度提供了可能；其次，高速度的投资冲动一般可能带来高产出，迅速增大社会总产品规模，这不仅可以迅速缓解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急剧膨胀而造成的沉重的社会需求压力，还可以为其进一步发展和农业的工业化提供必要的积累。其三，高速度也是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发达国家经济控制的有力武器，通过高速度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产值，使其可以不依赖发达国家的所谓“援助”而独立发展，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解除了发达国家通过这种“援助”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各种直接或间接控制，中国经济四十年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客观的经济环境决定的投资扩张是否必然推动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则必须依据本国的物质基础。投资要转化为生产力，终究要靠足够的投资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给。然而如前所述，我国失衡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进出口结构（不能充分利用国外原材料、能源市场来协调本国产业结构）不能支撑投资的急剧膨胀，反使中央政府诉诸行政的调整和紧缩。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行政性紧缩并未从根本上切除“投资冲动”的痼疾，也没有真正通过建立产业结构微调机制和进行产业间的资产存量 and 劳动力结构的调整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从而使限制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的障碍固存下来。于是，这种行政性经济调整本身就潜含了下一轮的冲动。一旦经过短期调整，使诸种经济参数的

紧张有所松动和缓和,经济体制孕含着的内在冲动不断地把投资推向扩张,而失衡的产业结构又不断地把投资抛向谷底,结果使我国投资及至整个经济出现冲动。

改革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伴随着扩大地方权限和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而逐步分解,中央政府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已日益分化为中央、地方、企业三个投资主体。但以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和扩大企业投资权限,增加非中央投资份额为特点的投资体制改革,在调动地方和企业筹集资金的积极性的同时,却由于宏观调控和市场发育的机制缺陷的并存,非但没有制约宏观投资扩张失控的危险,反而更加强了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冲动。

就企业这一新的投资主体来看,企业投资扩张冲动导源于内在的利益冲动,但要转化为外在的扩张行为,必须具备客观的经济条件,而在放权让利,单方突进的改革态势下,由于行政禁锢日益解除,而有效的约束又未确立,企业活动充满着相机抉择的自由空间。据国家体改委1985年对27个市429家企业调查表明,改革以后,企业扩大资金占用量的主要动因是下年度的资金留利水平而非资金利润率,因为,资金规模的扩大可直接导致企业留利绝对额增长。调查还发现,国营企业内部积累倾向要比集体企业低1倍,主要原因在于国营企业更易获得银行资金且信贷约束软化。信贷约束软化的原因在于银行本身所受到的约束就是软的。一方面,“税前还贷”使银行贷出的款项最终由财政保障和负担,充其量不过是对这种“财政自动投资”的暂时垫支,银行只需坐收渔翁之利。我国专业银行人均创利水平高于其它行业10—100倍,但并未实现充分的企业化经营,利益与风险严重不对称,1984年最高准备金比率达40%仍无法抑制信用扩张便是例证。另一方面,银行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专业银行实际上只受到指标约束而非财

产约束,其行为走向自然就是:企业乐于多贷,银行有求必应,必要时“送货(币)上门”。原因很清楚,除增加盈利外,至少还可以为争取下期贷额指标的提高创造条件。

银行预算约束的软化,导致更大范围和深度的扩张。银行扩张的主要动因在于盈利水平,其集中表现则是大规模增加固定性贷款。与1982年相比,1985年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只增长62.5%,而固定资产贷款余额则增长了161%,1986年信贷资金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已突破1300亿元;我国近年来银行贷款增加额中有1/3是固定资产贷款。由于固定性贷款激增,因而流动资金可供量下降。据统计,1982—1985年间,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共增加2416亿元,而同期间国营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量的增加额仅为其1/3;1985—1986年,工业企业流动资金需要增加量为1100多亿元,而供给增长量实际只有700亿元。

信贷扩张造成的供需总量缺口与结构矛盾最终抛向国家,在供需总量上,1987年社会结余购买力4270亿元,1988年上半年社会总需求比1987年同期又增长了31.4%,在产业结构上,1982—1985年,我国除冶金部门外,短线工业部门增长均低于40%,而机械工业却增长了107%,因此,由信贷约束软化所推动的企业投资扩张冲动必将引致我国经济呈波浪式推进。

就地方政府这一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看,1985年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政府财政包干和外贸包干制以来,地方行政力量的渗透不仅未能弱化企业及至中央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反而使其所属企业的扩张冲动更为加强。因为,地方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不同,地方政府不是社会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但对国内资源的支配额是其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其行政目标的有效保障。加之改革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参与支

持企业甚至直接投资扩张就成为一件既富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现实可能的事。据统计调查,全国每年1000多亿元横向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牵头搞的;1982年前十个月国家关、停、并、转产3700多个小企业,但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又自筹和新建投产了3800多个小企业。地方政府支持企业投资扩张的直接目的在于分享这种扩张冲动所最后形成的财源,为其本身的深度扩张作实力上的准备。地方的政府扩张活动是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争取有关资金,物资配给额;将自筹财力大量投向国民经济的非重点领域。1984年全国社会集资2000亿元,其中30%投资于基建,大多为计划外项目;1985年基建投资中中央项目比上年增长39.3%,地方项目却增长了65.2%;其中用于重点项目的投资比例,中央为62.4%,地方仅为19.2%。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出现的几次中央与地方分权(第一次是“大跃进”后的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第二次是“洋跃进”后的三年调整时期;第三次是1985年以来“财政分灶”时期)相应地推动我国经济迅速扩张,已经充分说明了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在我国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改革以来新旧体制的并存,由于宏观调控和市场发育的机能缺陷,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现实的经济环境决定的投资冲动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并未弱化,反而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使得投资扩张更加面临失控的危险,投资的波动以及由此引致的经济波动就成为困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

农业波动: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

以上我们剖析了投资波动引起经济波动以及投资波动本身的生成机制,但并不是说我国的经济波动是由投资这一经济变量单独

发生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口众多,粮食消费量大,农业资源相对稀缺,因此,维持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乃是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这一事实。

基于此,我们将对农业波动带动经济波动的机制进行初步研究。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农业波动的波峰和波谷分别超前国民经济波动的波峰、波谷约一年时间,这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迈向工业化的农业国中,农业的丰歉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重大。

农业低粮 谷年份	增长率	经济低经 济年份	增长率	农业高粮 食年份	增长率	经济高经 济年份	增长率
1954	1.6	1955	6.2	1955	8.5	1956	17.9
1960	-15.6	1961	-32.5	1964	10.3	1975	19.0
1968	-4.0	1968	-4.9	1970	13.7	1970	24.0
1972	-3.9	1932	4.5	1973	10.2	1973	8.6
1980	-3.5	1981	4.6	1985	5.2	1985	16.5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任务正如陈云同志说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首要任务都是保障人民的吃饭问题;其次才是求得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2%,耕地仅占世界耕地的6.99%。因此,尽管1980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经常居世界之首;④粮食单产水平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986年高出49.7%);其他家禽、水产也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保障众多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尤其是吃饭等问题的压力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丰歉和粮食产量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是保障吃饭还是实现经济的扩张,这就必然影响投资增长速度的上升或下降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升降使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在农业丰收,粮食充裕的条件下,政府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压力减少,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欲望高涨,由政府财政拨款的投资

规模扩大。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生产，农业又是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农业丰收直接为推动经济实现扩张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于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提高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经济波动进入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在资源和资金约束下，必然相应地减少农业的投入，加之我国平均六年左右一次的自然旱涝灾害，使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产量减少，结果，粮食紧张就必然增大政府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压力，迫使政府从追求发展速度转向注重农业生产和增加粮食产量。政府会迫于现实压力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又同时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低工业增长速度，投资和工业速度下降，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收缩状态。在增加农业投入，政府关注农业生产和实行科技兴农政策，增强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的情况下，农业又会出现再度增产，一旦吃饭的压力缓解，经济波动又将以新一轮循环展开。

政治因素变化：中国经济波动的社会基础

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基本上是一种高度集权的行政协调经济，国民经济的扩张与收缩主要服从于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主观判断以及为实现一定时期的政治目标而作出

的经济政策、方针、盲目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人民公社化”，力争十五年“超英赶美”，脱离生产力发展现实，好大喜功的“亩产万斤”，不顾本国实际的“洋跃进”等等，屡次证明了决策者的主观臆断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出现波动的重要政治背景。同时，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错误地强调革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唯生产力论”，提出所谓“政治第一，经济第二”，这种过分强调政治压倒一切的频繁政治运动也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尽管主观决策的政治干扰有所削弱，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仍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

正是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扭合在一起，共同推动我国经济脱离均衡增长轨道而呈现出非线性波动态势。

注释：

① $P = \text{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 / \text{经济发展平均增长率}$

②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182页。

③王东京、刘彪：《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

④参见《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1987)》。

(责任编辑：徐云鹏)

(上接第15页)

进生产和经营，降低消耗，开发适销的附加价值高的新产品，使企业扭亏为盈；一些原来盈利的企业，也会设法使企业继续更多的增加盈利。企业亏损了，每个职工的收入都降低，亏损越多，收入降低也越多；企业盈利了，每个职工的收入都增加，盈利越多，

收入增加的越多。企业盈利的多少与亏损的多少，和每个职工的收入多少直接联系着。企业每个劳动者，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必然要不断努力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这就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创造出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责任编辑 徐云鹏)